

文学都市 与影像民间

聂伟 著

——1990年代以来都市叙事研究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206.7/226

2008

文学都市与影像民间

WENXUE DUSHI YU YINGXIANG MINJIAN

——1990年代以来都市叙事研究

聂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都市与影像民间:1990年代以来都市叙事研究 /
聂伟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

(都市文学研究书系)

ISBN 978-7-5633-7498-4

I. 文… II. 聂…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33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7.75 字数:200千字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引言	1
第一章 都市民间：1990 年代以来都市叙事研究视角新探	5
第一节 从“城市”到“都市”：一种叙事主题的潜变	5
第二节 “都市民间”概念的特征性思考	18
第三节 1990 年代以来都市叙事民间因素初探	25
第二章 寻找“阿莱夫”：都市民间精神主体的显影方式	36
第一节 都市怀旧梦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空场	39
第二节 民间美学精神的个人重塑	48
第三节 徘徊于智性和审美之间	67
第三章 知识分子的原始正义与都市底层的弱势言说	87
第一节 都市底层移民叙事：来自边缘处的声音	87
第二节 失土的“泥鳅”与无声的尖叫	102
第三节 两难处境与现实主义写作	112
第四章 在身体的世界里：民间叙事的个人政治修辞之一	124
第一节 身体与民间：被转换的叙事策略	130
第二节 都市民间叙事的欲望辩证法	140
第三节 回归身体与精神试错	151

第五章 解读“民间”:文本实践的“间性”游走	164
第一节 文化比较视野中的概念辨析	165
第二节 面向“民间”的当下性	172
第六章 民间影像:新生代电影叙事的价值询唤	176
第一节 新生代电影“民间质素”分析	176
第二节 都市底层世界的欲望漂流	182
第三节 寻找都市叙事的“确定性”	191
附录	
“民间”的“地气”断了之后	206
影像“原乡”与民间叙事	216
在精神局限与人文良知中追问生存真相	224
“民间”精神的当代知识境遇	230
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2

引 言

为求得理解的便利,笔者想从以下几方面的思考引入本书关于“都市民间”这一研究课题的讨论。

第一,该课题研究的缘起: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与文学发展都步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围绕这一文化格局的描述诸如“无名”、“喧哗”^①、“杂语”^②、“多元化”和“个人化”等等词汇,大都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上述看法之于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与影像叙事发展现状的描述同样是有有效的。显然,1990年代文学和影像叙事的发展与演变受到了世纪末中国社会转型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同样地,1990年代的都市叙事也以其自身的独特面貌反映了并参与着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多重领域的现代性变动与价值重构。这个作用/反作用的张力场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将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显示其重要的影响。

以上术语的描述基本上概括了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都市叙事处身其中的社会文化现实。而我的思考则是穿过这些比较宏观的文化现象描述与语词的表层,从一个相对微观的角度入手,进一步体察艺术创作者个体内在的精神世界建构在他(她)的文学或影像作品过程中是以怎样的审美形态表现出来的,与此同时又通过何种方式表现出自身

① 参见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参见王一川:《杂语的时代?》,天津:《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1期。

2 文学都市与影像民间

美学特征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这句话也可以这么理解,面对“无名”时代的精神氛围,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又是以怎样的叙事审美创造与叙述形态重塑,在文本的世界里借助一己之力修补、恢复都市叙事与当下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精神关联,进而获得把握问题、解释问题的新的文化价值取向。

第二,方法论问题:

在1990年代以来都市文化创作的“无名”格局中,笔者有意将那些自觉疏离于强势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的知识分子创作作为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显示出较为鲜明的民间性和边缘化的特征,而对这种立足于边缘化角色的主动认同也使得他们的创作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

首先,1990年代以来都市文化生态格局的“无名”状态,形成了对主流宏大叙事“共名”的多层次拆解;而作为“无名”格局中的一种声音,坚守知识分子民间立场的创作显然也丰富了当下都市文化的表现内容。“无名”与“民间”这两个指称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但不能将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理解。

其次,从理论上讲,知识分子的民间创作都天然地站在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异的另一极,是以自身独特的现代性美学追求来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吹的现代性的“解魅”。但在具体的文化现实实践中,这样的自觉疏离又常常受到市场经济、政治禁忌和文化现实生存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知识分子通常会采用审美层面上的美学暴动——如对主流化的叙事主题的逆转、通过对原有叙事对象的反讽以及叙事内容的重述等多种方式——实现对主流意识的批判和解构,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文本中所体现出的某些个人化的精神探索也可能会因为多重意识形态的掣动作用而逐渐偏离了最初的叙事期望与价值指向,而变得虚无与高蹈。

再次,知识分子立足民间立场的都市文学写作,在审美形态表现上可以表现为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坚守,进而完成反抗主流话语的政治修辞;也可能会超越个人/主流的二元对立,在崩落的文化传统记忆的碎片中重新整合出虚拟的民间审美形态,借以抗拒主流话语与商业意识

形态的精神侵占;也可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近距离关注和描写,以客观现实主义的纯然再现,直接戳破新的意识形态的谎言。在思考以上问题时,我所借助的方法论主要来自于杰姆逊“意识形态的动力学”理论的启发,即“一个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将会探索其权力的合法化的种种策略,而一个对立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则常常以变通的或隐蔽的策略来抗拒和瓦解支配的‘价值体系’”。而在面对 1990 年代以来都市文学与艺术创作的复杂现象时,“都市民间”视角就是进入上述问题的一个理论入口。

第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都市民间”这一概念最早曾出现在《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①一文中。具体到中国 1990 年代都市社会更见其陌生的文化现实,本书试图对这一概念做出以下粗线条式的特征性描述:

“都市民间”是隐匿于现代都市庞杂意识之中的一个审美文化空间。它与都市文化中的日常生活记忆和底层个体存在的边缘意识相伴而生;相对于主流意识话语而言,它处于权力边缘化的弱势一极,是现代知识分子转移庙堂、广场的价值取向后,以平等的姿态参与都市文化书写与精神建构的一种新的写作立场;它以破碎、虚拟和朴素的审美形态表达出对都市现实生活的多重的人性化体认,因而体现出藏污纳垢的本土现代性美学风格。

第四,论文各章与附录中涉及的研究内容:

第一章:围绕“都市民间”概念的特征性描述,进而具体讨论 1990 年代以来大陆都市文学叙事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本土现代性追求;

第二章:以王安忆 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以“上海”为题材的系列小说创作为例,探讨精英知识分子写作者如何在主流的都市意识形态神话之外寻找民间审美精神主体自我彰显的过程;

第三章:勾勒都市底层移民文学的形成与分化过程,借助文本还原

^① 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上海:《上海文学》,1995 年第 10 期。

4 文学都市与影像民间

来自现实民间世界的声音,讨论知识分子的原始正义观念与底层写作实践,发掘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生活的批判性精神力量;

第四章:以1990年代以来都市文学中盛行的身体叙事为切入口,在个人政治修辞学的意义上理解知识分子立足于民间立场上叙事策略的转变,并探讨其现有的美学不足与精神超越的可能性。

第五章:辨析“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和“都市民间”等三个概念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和各自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借此进一步说明“都市民间”视角对于当下知识分子参与都市文化现实空间创建的重要意义。

第六章:也可以称之为“外一章”,是我近期思考的初步成果。以民间视角对1990年代以来的一批新生代都市电影叙事展开研究,检验“都市民间”这一概念的跨文本阐释空间。

还需要交代的是,虽然我在前期构思阶段也考虑到了1990年代以来文学叙事中“乡土民间”与“都市民间”之间形态转型问题,但限于时间和学力,尚未进行专章研究。因此特列“附录”,希望能够借助几则个案分析加以补充说明。此外,“网络文学”作为1990年代新生的重要都市文化空间,本书未及进行专门的讨论。这些遗憾都希望能在此后的研究中得到弥补。

第一章 都市民间：1990年代以来都市叙事研究视角新探

第一节 从“城市”到“都市”： 一种叙事主题的潜变

为求得叙述的方便,在本书的开篇,我想首先就某些基本概念的使用做出约略的交代。首先是“都市叙事”的指称。尽管在我们的日常用语里,“城市”和“都市”这两个词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在具体的使用语境中也不会产生太大的歧义;而且具体到文学和影像叙事领域里,所谓“都市叙事”和“城市叙事”的表现主题、内容和研究对象,事实上也常常避免不了相互的交叉与重合,但在本书行文中,我依然倾向于使用“都市叙事”这个概念。

—

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汉语言中“城市”这个词是由我国古代“城”与“市”这两个概念结合而成的。“城”是指四面围以城墙、具有防护作用的军事要塞。《管子·度地》中说:“内之为城,城外之为郭。”《古今注》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这说明早期的“城”的概念偏重于政权统治的功能,是朝廷或官方政府力量的所在。与之相对的“郭”则是民众聚居的地方,所以城在内部、在中心,而“郭”在城的外围和边缘地带。清代袁枚在《雨过湖州》中曾赋有佳句:

“州以湖名听已凉,况兼城郭雨中望。”

与“城”的基本功能不同,最初的“市”则专指商业交易的场所。《易·系辞下》中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于早期的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市”就往往聚集在众人汲水的井边,由此“市井”连用,偏重于市场和街市的意思,如《管子·小匡》中就有“处商必就市井”的说法。《周礼·地官》中则有更为详尽的说明:“大市,日昃而市,百姓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私有制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的交易和流通日益成为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货物贸易的聚居地也同时成为构建城区的中心。在政治与经济双重合力的作用之下,“城”与“市”两种形态逐渐合而为一,再经由长期的发展与演化,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古代城市的布局与结构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在乡土中国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城市这个独特的地理处所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城市的形成、发展、繁荣、迁移或衰落,常常作为周边地域社会文明演变历史的缩影而受到后世社会学研究者的重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里,它们通常是国家和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交流中心,是人们赖以实现各种欲望需求、满足各种消费享乐的集体场所,同样也鲜明地体现出了某一地区的民俗文化特征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城市的发展与变化在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程度不同的生动体现,由此,文化形态构成的地域性差异就成为中国城市文学滥觞以来所着力表现的潜在主题之一。譬如最早的城市文学作品之一、南宋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通篇都在缅怀中州旧日繁华和故都汴梁的盛貌,其中也大量地记载了中州故地的民风民俗,直到今天仍然是考察彼时彼地风俗民情的重要文献资料。

同样地,通过文学反映出不同城市文化性格具体的地域性差异,这些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中同样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如近代文学家韩庆邦引领海派文学之先声的小说《海上花列传》,通篇大量地使用了香艳呢哖的苏吴口白,因此更适宜江浙地区市民大众的阅读趣味。可以看出,在此类作品提供给读者独特的文学审美经验中,不仅携带了从新的社

会时代精神里嬗变而来的某种新的文学现代性审美风尚,而且也通过对同时代公众阅读趣味的引导,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读者对于文学作品和流派分类的基本判断,使得我们对文学“海派”内涵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携带了某些地缘文化厚积深重的历史影子。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930年代文学界“京海之争”那段聚讼沸然的历史公案。1933年作家沈从文著文批评了当时文坛流行的“玩票”、“白相”习气,进而提倡“厚重”、“诚实”的文学态度。^① 尽管当时沈氏之感发并不在于文坛上所谓南北地域之分,然而此后一系列言辞激烈的回应文章,大都一厢情愿地将“海派”和“上海作家”划归一谈^②,或为辩驳,或为正名,为此闹得沸沸扬扬,直到今天余音犹在。而这场被部分当事者最终视为“无谓”的论争,在今天看来,除却持论者概念理解的随意性和情绪表达的狭隘之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还在于长时期以来沉潜于北京/上海、北方/南方地缘分殊的某种常识性理解所形成的文化偏见,这恰恰又回到历史上京海之争的老路子上去了。

应当承认,城市文学对于被表现对象的现实性地缘文化特征的关注,是内在于世界城市文学发展历史中的一个普遍题旨。一方面,世界上不同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熏染滋生的气质与性格,深深地影响了文学城市的形象塑造和精神审美形态,使之相应地具有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胎记。另一方面,在城市发展历史的前期,由于受到地域阻隔与民族文化的交往局限,世界城市在地理、经济、社会、文化、语言、政治制度、自然环境直至建筑文化形态上各自所表现出的自足性,导致了处于农业文明笼罩下的古代城市社会、城市文化的生成形态及其相应的文学审美表现,也相应地表露出相当明显的地域文化的特征性差异。这都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城市文学与其所在地域(region)风俗文化之间的整体性构成特征和彼此相生相成的依赖

① 参见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10月18日,第8期。

② 参见苏汶:《文人在上海》,《现代》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阿英(署名“青农”):《谁是“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9日。相关的争论文章还可见于当时的《大公报》、《中央日报》和《太白》等报章刊物。

性关系。比如17世纪流行于欧洲城市文学中的巴罗克文体,它崇尚阴冷的情调、夸张的比喻、华丽的辞藻和参差复杂的笔法,这与彼时欧洲城市建筑和装饰的风格极为相似。而同一时期的日本江户时代则以町人阶层“好色物”的经济生活为主要特征,以他们颓废虚无的精神观念为描写主题的浮世绘也就应运而生。

中国小说起源于城市,这早已为历史学界的考证所充分证实。在中国城市文化的审美流变过程中,也常常以大量的地域文化和乡土民俗风情作为其所依恃的现实性社会背景。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它和冯梦龙的“三言”、“二拍”共同推动了中国白话市民小说的发展。自北宋话本小说兴起之后,此后这种反映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世俗娱乐欲望和审美情趣的文学传统,在明清的绣像小说和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中得到了继承,并一直明昧乖舛地延续到当代。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评论者来评价老舍、汪曾祺等人浸淫着传统市民文化气息的小说创作,还不外乎以所谓“民俗风情画”之类的修辞来作为对作家作品的最高褒扬。^① 这一方面固然是受到了写实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但也应同时说明,他们对市民文化和都市文学的理解和评价基本上仍旧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的,至今也依然不失为一种能够继续发挥成效的研究思路。这方面最新近的例子就是2002年前后在《东方》杂志连载的一系列城市文化写真^②,也是通过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关键词罗列,以“地域人格化”的文人眼光来传达潜隐于不同城市日常生活表层之内的地方感性精神。

然而以上只反映出问题的一个侧面。在我看来,依照研究对象所

① 类似的评论在传统的作品研究和文学史理论的叙述中俯拾皆是。

② 这一系列城市写真包括:《何谓精神生活——以北京为例》(尹丽川),《何谓本能生活——以成都为例》(洁尘),《何谓感伤生活——以南京为例》(魏微),《何谓城市生活——以哈尔滨为例》(朱碧),《何谓感性生活——以海口为例》(李少君),《何谓日常生活——以昆明为例》(于坚),《何谓市民生活——以上海为例》(张闳),《何谓享乐生活——以苏州为例》(朱文颖),《何谓时尚生活——以天津为例》(朵渔),《何谓悠闲生活——以西安为例》(秦巴子)和《何谓诗意生活——以厦门为例》(丹娅)等。

处的地缘文化和传统民风民俗的具体考察,进而阐明城市历史演变、现实存在形态以及想象未来的发展空间,这只是面对城市文化叙事诸多研究思路中的一种。在承认其有效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在另一个方面所产生的理论遮蔽,即这样的思路无法进一步呈现出在世界城市漫长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城”与“市”两个要素之间彼此消长的真实情形。

二

如果辩证地用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就会发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市”与“城”以及它们彼此所代表的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峙和分离,几乎从世界城市历史的开篇伊始就一直如影随形。不可否认,在世界资本市场萌芽的最初阶段,的确需要借助城镇这种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为市民提供固定的商品交易社区和财产庇护所。直到中世纪以前,西方城邦的存在都一直为资本的生产消费和市民的世俗生活提供了稳定有序的制度保障。^①“城市空气使人自由”^②,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孕育出新兴的市民政治文化,它们部分地满足了市民阶层渴望安全感、归属感、热爱自由和追求世俗欲望的天性。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凭借高大厚重的、层层包围的城墙围筑而起的城市也是商业贸易的集散区域和手工业者阶层的主要聚居地。它不仅承担了对外文化交流和商业经贸交往的门户功能,同时也以一种强势权力向周边幅员广阔的乡村地区完成着经济辐射和政权控制。这也就是古代建筑形制中所强调的“度地卜食,体国经野,都鄙有章”。

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早先城市形象所代表的权力体制、等级分层、贫富落差和经济掠夺,不仅与城市中新兴的市民工商业者阶层对

① 参见穆罕默德·哈塔米著,马贵生译:《从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26页。

自由贸易和政治权力制衡的自发要求相抵牾,而且也渐渐开始不见容于地处城市外围边缘更为广大的乡村世界。我们看到,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对峙和社会阶层划分,直到今天仍然阻碍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整体发展。而在城市社会组织机构内部,中世纪西方封建城市社会中出现的市民阶级,已经开始成长为与封建社会结构存在了巨大离心力且难以被封建社会结构所同化的新的社会因素。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重新看待“城”与“市”的关系,并且进一步剥离它们各自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就成为世界城市发展必然要遭遇到的时代分水岭。我们看到,欧洲最终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城市革命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的束缚,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而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内的中国城市之“城”所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统治功能,对新兴的商业市民阶层依然具有强大的抑制力和同化能力。尽管如此,“市”对于“城”自发的离心运动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依然有着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自唐以来,随着抑商思想的减轻以及商业的繁荣,相伴而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开放。具体表现在城市的内部建制中,可以看到唐代里坊的瓦解与市场的发展过程也是同步逆行的。先是居民房屋开始冲破坊墙,直接向街道开门,甚至将屋宇建在街边。为此唐代政府曾明令禁止。到唐后期,居民向街开门、侵占街巷已是普遍现象。而城市宵禁制度的废弛和城市夜生活的兴起,即成为城市破除封闭、面向开放的重要标志之一。与此同时市民阶层与官方的矛盾冲突也渐渐趋于表面化。唐代商人曾经因为官府肆意掠夺造成“家著被盗”的惨境而集体罢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诉”。而到了明朝中后叶,矛盾则进一步激化升级为苏州地区大规模的机工暴乱。^① 这些现实性问题在艺术作品中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表现。当时的一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②曾经生动地反映了明中期都城南京的繁荣场面:在一个大全景的画面,各种商店摊铺比比皆是,坊肆之间人群摩肩接踵,以至于遮没了道路。该图纵44厘米,横

① 参见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页。

② 参见路应昆:《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封一。

350厘米,绘制有上千位职业身份不同的人物,109个商店的招幌匾牌。这幅画卷给观者的整体感觉是城市的街衢已经渐渐拢不住庞大市声与人群的喧嚣,似乎在暗示偌大的城市街区正时刻面临着被快速增生的市场和人群拥塞、甚至胀破的巨大危机。而较晚近的事例则是上海300年间建城与拆城的历史变局。早在明嘉靖年间,上海人为抵抗倭寇侵袭,“斯城不筑是以民委之盗也”,市民自发捐资建城,“开筑城垣,以为经久可守之计”。^①而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上海成为近代远东的大都市,“因城垣阻碍,县市难兴”,“非亟拆城不可”。又是在市民工商户的强烈要求下,到1914年上海城墙基本拆除完毕,由此形成了“现代”的上海都市雏形。^②

这种世界性范围内“城”与“市”相分离的趋势,与其说是古代城市构成的外部形制所引发的变化,倒不如说是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危机和最终发生质变的结果。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伴之商品经济交往的增加,城市的社会功能定位逐渐从政治军事中心过渡到了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尤其进入近代以来,世界性范围内的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吸引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大量人群的流动,劳动人口成为城市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其结果是带动了城市从消费性向生产性功能的过渡,从而确立了城市形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野,由此城市的空间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潜变。早期确立城市之为“城”的醒目标志如城墙,开始从人们的视线中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则是越来越巨大的商业市场,以及联结各个商业网点之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从“城”与“市”并举,到有“市”无“城”,是世界城市的总体发展趋势。这中间势必要经历着两者此消彼长的漫长过程,尤其近二百年来世界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数量和规模都空前扩大,城市的功能和作用也日益趋向复

① 参见上海市地方志网站,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nanshi/node43774/node43779/index.html>

② 参见顾廷培:《漫说上海的城墙》,施福康主编:《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杂多元化,“市”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和大众生活的主导力量。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发展浪潮被人们称为“都市化”(Urbanization)^①进程——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市”都是这个发展过程中一种过渡性的社区聚居表现形态,而它的内涵和外延较之“城市”的概念则显得更为丰富和驳杂。

在中国都市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对“都市”一词的指称,较早的记录可参见《汉书·食货志上》:“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有关“都”的记述则出现得更早。《干旄》(《诗经·国风·邶风》)中有“孑孑干旄,在浚之都”,《礼记》中有“筑城郭,

① 关于都市化(Urbanization)的概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一般人往往把都市化看作是反乡村化的过程。地理学家强调农村向都市转化过程中的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的转变。经济学家强调从农业向非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学家则以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程度作为评判都市化程度的标准。在我国往往强调都市化进程中人口变化的因素,比较有影响的定义是:都市化是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比例增长的过程,更确切地讲,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在城市集中的过程。而《失衡的中国》一书中是这样界定的:“城市化通常是指,人口向城市或城市地带集中,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集中。这种集中过程表现为城镇数目的增加,也表现为城镇的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充。”今天,随着都市化内容的变化,都市化的概念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美国新版的《世界城市》一书就把都市化定义为:“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其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是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人类学家认为:“都市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应该是指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的这种过程。”在城市与乡村的相互渗透、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互相接触和融合后,产生了一种试图整合两者的社会理想,使其既含有乡村文明的成分,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成分,这种现象即为“乡村城市化”(Urbanization)。随着乡村城市化而来的是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的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的变化与城市逐渐接近、趋向同一。因此本书在借用“都市化”的概念中,其中就包含了对中国“乡村城市化”问题的思考。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人类学上习惯把城市的发展划成三个阶段,即前工业城市、工业城市和后工业城市。虽然在城市史上,前工业城市占据的历史最长,但人们认为真正的都市化应该是工业城市产生以后。